

第1章

中国的崛起

如果需要提醒世人正确推进全球化是多么重要，那么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则给我们上了沉痛的一课。这次悲剧性攻击揭示了那些激烈反对富足和自由的人们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的破坏作用，而这种富足和自由正是开放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只是靠保证取得更多的全球化成果和更广泛地分享这一成果，并不能制止恐怖主义。但是，我们可以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世界正变成一个分裂的世界，形成了能从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全球化的开放中受益的人们和不能从这一过程受益的人们的对立。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越来越多的麻烦，包括环境恶化、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等。

在中国讨论全球化比在世界任何地方讨论这个问题都更有意义。无论是对未来几年，或是对未来20多年的展望，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处理她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众多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随便列举一个方面，无论是环境、军事，还是国际事务、经济全球化，中国的选择都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做出错误的决策，那么无论是对中国13亿人民，还是对其周边国家而言，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相反，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富足、开放的社会，那么她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遭受攻击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中国经历了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而这一切却由于当时世界正努力对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而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9月17日，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同意了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最终条件。对中国而言，这项协议结束了中国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策，它将使得中国走上更广泛的、持续的经济改革之路。这场改革将会扩展到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这个协议显示了中国将按照国际贸易规则办事、促使她的政府机构变得和世界规则相协调的愿望；中国的政府机构一直被认为是不透明的、低效率的，而世界规则要求公开和公平。

中国人世协议的达成和纽约、华盛顿的袭击事件在相近的时间内发生，当然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巧合突出体现了支持自由、开放的世界的人们和试图毁掉这个世界的人们之间存在的斗争。无论是有着来自世界上80多个国家受害者的世界贸易中心，还是世界贸易组织，都代表着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后的前30年里执行着多变的、令外国人费解和不安的政策，现在选择加入一个以全球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并把不断增进繁荣作为她的中心任务，这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在20多年前开始经济改革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其重要性可以与中国在1964年核武器研制成功相媲美。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

办权，有助于中国重新确立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加速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这场革命以后将不只在沿海地区，诸如上海和广州进行，而且将会扩展到内地，例如重庆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将保证中国通过不断对国内外竞争者开放市场而增加市场化改革前进的动力，并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入世”有助于中国实现她的使GDP在2010年翻一番并跨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行列的目标。的确，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上述预测并达到这些目标，那么中国届时的GDP将达到2.2万亿美元，或者略高于目前德国的水平。总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加速整个中国社会广泛的变革，为席卷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增添动力。

反过来，一个不断走向强大而繁荣的中国，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必须适应这一新兴的经济大国，也许还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是随着中国获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和融入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按国际准则办事的大国，这对世界是有利的。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个新的地区性或国际性大国的到来向来都是伴随着喧嚣不安的。而世界贸易组织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载体，可以保证这种过渡相对安静而平稳地进行。当今大国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面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时曾经犯过可怕的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是退出了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而实行很

具有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一系列悲剧性错误预测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几千万人的伤亡。中国当年与这些利害事件的每一阶段都息息相关。世界应该鼓励和欢迎一个追求开放而且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中国。促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融入一个由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经济行为规则构成的体系，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内在价值对中国而言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贸易利益。

从最简单的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是为市场经济建立规则。它将消除目前的对国营公司优惠而对国外公司和本国私营企业歧视的不公平待遇。通过向国内外开放从农业到金融业的保护部门，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地位将会保证经济改革的持续进行。上千的中国国有公司将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将被淘汰。银行也面临着类似的变革，需要清理其账面上的巨额坏账，其中大部分坏账是对决策失误的国有企业贷款所造成的遗留问题。政府必须变得更为开放，更为可靠。最后，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预计将在现有高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经济学家预测，尽管在最初阶段会遭受一些经济上的冲击，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满五年起其每年经济增长将会比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高0.8个百分点。这听起来好像

没什么，但在经济增长方面累积的效果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比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增长大约260亿美元。随着协议规定的在2004年取消纺织品出口限制，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年份里会更加巨大。IMF只是从关税削减的角度来看待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把降低了外商投资者的风险成本也考虑进去，那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大一些。²

然而，如果不利的情况发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使整个国家到处充斥着进口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这将使已经处于困境的农村地区和脆弱的国有企业的情况变得进一步恶化。同时，随着效率更高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从事生产和进口国外商品，8500万国有企业工人中约有2500万人将会失去工作。不应忘记，中国的WTO进程始终伴随着风险与憧憬。³

中国如何应对入世引起的挑战非常重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里，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比不加入减慢0.3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少增长30多亿美元。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下降将是短暂的。只要政府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刺激手段，从而建立包括有效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络在内的现代机构，将会把中国引入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如果像许多改革者希望的那样，世界贸易组织能帮助中国建立一套更合理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政策，那么对中国9亿农民和其他农村人口而言，其

意义将会像中国5000年历史中任何一次变革那样重大，这将给予农民自主选择种什么和卖给谁的自由。对工人和商业人员来说，情况也基本如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是为重绘中国美好蓝图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预计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经济体。中国领导层坚定地重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要理解其中原因并充分体会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极其重要，研究一下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的中国近代历史，将会很有启示意义。那是一段混乱和屈辱的时期，昭示了中国开始重返世界强国之林前如何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衰败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

考察中国的开放

在很多个世纪里，中国发达的文明和众多的人口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事实上，一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仍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8.7%（高于当代美国所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并且远远领先于当时处于世界第二位的印度，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是16%。法国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处于世界第三位的国家，份额是5.4%。再往后，美国名列第九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有关中国为什么丧失了这一以往存在的优势和如何恢复已经失去了的辉煌，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的精英阶层——学生、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政治领导人。尽管中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

的问题，但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恢复在世界上原有的地位，这一强烈愿望团结着所有的中国人民。这一愿望促使中国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 4

古代中国曾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包括从火药到造纸等的发明。中国的皇帝曾经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时间也是最长的。前后相继的8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尽管皇帝控制的版图有过扩张和收缩，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一条相对独特和连贯的文化、文明和治国发展的轨迹。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明能保持2000年以上连续发展的记录。

然而，中国没能步入现代世界。当西方世界进行工业化革命时，中国却没能发生变革。中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很长时期内发挥着作用，促使巨大的国家保持着统一强大的政府机构，加上民间监督和有效的中央控制，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现在，这种体系的僵化性制约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力量的脆弱性不允许统治者向改革主义者让步。统一的政治体制允许中国统治着广大的地域，并且不会像短命的亚历山大帝国那样，中国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使之能在改朝换代中保持版图的完整。

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制度意味着没有任何地方权力可以挑战皇帝。中国不允许存在欧洲曾经存在过的城市国家。中国没有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英国贵族曾经用它迫使他们的国王适度地稀释了他的权力。在中国，没有那

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存在的城市可以和中央帝王分享权力，或者皇帝和教会神职人员分享权力的安排。文艺复兴和它的智力成果交替作用，使得欧洲经济加速发展成为可能，首先是发生了农业革命，接着发生了工业革命。

中国很少注意这些变革。自我发展的封建帝国仍然陶醉在自身的强大之中。中国的封闭状态在 1793 年乾隆皇帝的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当时有一个豪华的英国使团在劳德·乔治·麦卡尼（Lord George Macartney）的带领下来到中国。英国人，就像在此之前或之后的许多外国人一样，极想和中国开展贸易。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着他们，就像今天的可口可乐公司和宝洁公司被中国市场所吸引一样。但当时的英国使团是一个遭受挫败的、行而未果的使团。乾隆集中表达了中国的观点，那就是首先轻视对方，然后拒绝创新。面对英国送上的用来炫耀英国巨大制造能力的礼物，乾隆有一个很著名的答复：“我们历来轻视投机取巧的东西，并且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你们制造的产品。”⁵

英国人不会因为乾隆的拒绝而善罢甘休。他们和其他西方强国继续寻求贸易权利。中国澳门地区从 1557 年起成为葡萄牙人的一个贸易中转站，当时中国人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一个小站点，作为对葡萄牙人帮助驱逐日本海盜的奖赏。商人可以在中国政府规定的时间和限制条件下，通过澳门同广东（今天的广州）的买办进行贸易。英国人

和其他外国商人加入了葡萄牙人的行列，通过利用中国南部的这些贸易站点同中国人建立了贸易往来。

但是英国人渴望攫取更多权利。冲突开始于鸦片战争，英国人为赢得同中国人的商业和贸易权发动了这场战争。这个名字来自一种利润很高的商品。当时，英国决定卖这种商品，而中国人决定禁止鸦片交易。1842年，中国人被迫放弃珠江三角洲顶端的香港岛，作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赔款的一部分。英国人的胜利刺激了其他国家压迫中国取得好处的野心。到19世纪末，中国已经被外来列强所瓜分。几乎没有哪个重要城市能避免重大的外国势力的存在，这些外国势力的存在常常以一个与社会隔绝开的外国综合建筑设施为标志。

在大炮外交之下，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予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大量的特权。其中有一些所谓的通商口岸，成了外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尽管中国香港地区是第一个通商口岸，但截止到1949年，上海是最著名的一个。对外国人而言，从中国取得法律上的豁免权似乎更重要。因为他们不信任中国的法律体系，他们要求并取得了免受中国法院审判的权利，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严重的主权侵害。这些条约也给予外来列强制定关税的权利，并可以征收关税。在海关管理方面，外国人取得了中国的航路设置、领航和邮政系统的控制权。中国的现代经济是一种外来经济。英国的贸易公司例如巴特菲

尔德·斯威尔（ Butterfield & Swire ）和嘉迪恩·麦森生（ Jardine Matheson ）统治着大多数的通商口岸。外国银行，例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命脉。 19世纪晚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康有为深有感触地抱怨他的国家像瓜一样被切分了。

直到今天，中国人仍坚定地认为这些强加给他们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些伤疤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当然，中国人天性善良，有时候很容易消除对由向外部世界开放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所带来变化的猜疑甚至敌意。想一想两个世纪前，这是一个对国际贸易毫无热情的国家，而近二十多年来，却变得极其渴望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变化是多么令人惊讶！毕竟，中国当年是被迫开放，受制于许多屈辱的条约，授予外国人史无前例的特权，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虚弱不堪。国家媒体经常宣扬这些受伤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令外国人感到有点苦恼。但是这些民族主义宣传因为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能够引起巨大的共鸣。

日本在 19世纪中叶也面临着相似的西方国家要求其打开国门进行贸易的压力。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日本从 1868年开始推行明治维新，从而成功地走上经济现代化之路。而中国，像她的邻国朝鲜一样，不能实现这种变革。19世纪末的一系列谨小慎微的改革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中国在 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中蒙受了新

的耻辱。民族主义者不能下定决心把外国人驱逐出中国，而只是杀死了几百名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为了报复这次屠杀，外国列强的军队侵略了中国，这次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领土标志着对中国主权的侮辱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行将崩溃的经济进一步陷入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之下，这些赔款是入侵中国的各个强国商定的作为对它们在义和团运动中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部分。十余年之后，即在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中国的封建王朝至此走到了尽头。

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没能够填充清帝国崩溃之后留下的真空。接下来的年代是一个冲突和混乱的时代。事实证明，中国最著名的反清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也未能有效地领导中国。军阀和革命者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连续不断地混战。外国列强继续欺压软弱的中国，从中渔利。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标志着对中国更进一步的瓜分但是中国当时两个主要的政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却不能有效地联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提供了一些时机。但是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双方开始了国内战争。尽管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还是被击败并被迫撤退到台湾。除了台湾、香港和澳门之外，中国传统的国界大体上得到了恢复。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任意分割的“瓜”。但是战争使得中国遭受严重破坏，陷入经济贫困、财政枯竭的状态。

发生变革

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革命者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清除了外国势力的影响，实现了大部分的民族权利。但是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在贸易上进一步遭受挫折，其结果是所有的外国公司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在上一个世纪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中国过去曾是可口可乐公司除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市场，是第一个海外软饮料年销售量超过100万箱的国家。但当时可口可乐被迫停止了在中国的所有业务，并且在其后的30年里没能返回中国。一些中国人也前往香港，为这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提供了必要的力量，但却使上海这个那时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商业中心衰落了。

中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彻底的农业改革。截至1956年，农业已经完成公有制改造。除了很小的自留地之外，各地除西藏以外的私营农业都被废止。在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土地改革的第一年里，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但是土地集体化的推行并没有实现毛泽东曾预料的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

接下来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混乱和经济上的停滞不前。中国发生的政治巨变依然是很重要的，它们使每一个经历过这

些动荡的人从内心里渴望稳定。政府也因此能够证明实行严格控制的措施是适当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东欧某些国家和前苏联解体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就像某些人士警告的那样，混乱可能会导致中国走前苏联、南斯拉夫或者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道路。同样，出生在1978年之后的相对富裕的环境中并且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的年轻一代，也对变革有着恐惧感。

动乱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落伍了。到1978年，中国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此处疑有误。——出版者注）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几乎占到了1/3。中国现在需要快速发展才能弥补失去的往昔。

走上改革之路

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长着一张圆脸的农村出身的中国人推动了另一次伟大的中国革命。邓小平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出生于四川省靠近长江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曾经在巴黎和莫斯科留过学。邓小平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革命组织者，参加过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邓小平在革命胜利后成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1956年，邓小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而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革命家。在大跃进问题上，邓小平曾经和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批判，并被下放到地方去劳动。

他的儿子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遭到批斗，从北京一座楼上跳下，也许是被暴徒扔下去的，从那以后成了残疾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有着亲身体会。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两年以后，邓小平揭开了一系列大胆改革的序幕。他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单个农户自主耕种自己分得的小块土地的权利。在满足了国家规定的收购配额之后，农民可以把剩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公开销售。推行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废除庞大但生产力低下、当时占农业生产主导地位的公社制度。通过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从而提高了粮食储备。农民开始从农村向企业流动，种地者的比重由1978年的71%下降到1995年的50%。

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倡导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有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几乎和全美国的人口一样多。人均收入翻了两番，农民和城市居民开始购买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商品。电视在邓小平改革之初，是一种奢侈品。而在他倡导改革20多年后，电视已经进入绝大多数寻常百姓家了。因为邓小平决定使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中国每年吸收外资达400亿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这些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在20世纪80

年代末，通货迅速膨胀，造成许多商品价格飞涨，投资激增。政府于是紧急刹车。经济开始在严厉管制下运行，许多外来投资者都感到十分沮丧。接下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并最终平息下去。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经济改革的前途令人有些怀疑。1992年，87岁高龄的邓小平采取了最后一次重大行动，他视察了中国南方靠近香港地区的繁荣的经济特区深圳。他敦促各级领导加快经济增长，推动经济改革和外来投资的发展。尽管当时邓小平已经从所有重要职位上退休，但他仍然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南方之行震动了中国，并且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在连续几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2%。即使有些经济学家怀疑中国夸大其经济增长数字，但这几年的增长速度仍令人吃惊。1992年，邓小平号召加速改革给中国经济“充了电”，当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2%，1993年增长率达到13.5%，1994年达到12.7%。即使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对经济实施“刹车”措施，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是减慢到10.5%。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重新开设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另一个重要的位于深圳的股票交易所也在同期设立。1992年8月，深圳出现了数万人涌向交易所要求取得新股申购申请表的情景。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存在着背离经济改革的可能性。邓小平曾经和党内许多反对他所倡导的务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